

## 关于研究方法

——读《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有感

刘 能

费孝通先生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再次提到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sup>①</sup>,尤其是涉及到方法论中存在的一些争议,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方法论问题,自从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 Weber 提出的“价值中立”命题上<sup>②</sup>,其它的方面,在高校社会学中,实际上主要已经接受了美式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观点,认为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是社会学追求的目标:命题、假设和变量以及

① 主要指针对 Firth“微型社会学”和 Freedman“社会学的中国时代”以及 Leach 对中国人类学的批评所做的一些思考(费孝通,1996a:2—19)。近年来陆续发表的理论反思文章还有:《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7—17页;《关于人类学在中国》,北京:《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1—4页;《人不知而不愠》,北京:《读书》,1994年第4期,第41—54页;《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4—14页;以及《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北京:《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第53—68页。

② 对 Weber 的“价值中立”命题的关心体现了中国社会学重建初期的共识:避免争论高于一切。科学精神和经世传统之间可以由此找到统合之点。方法论方面的其它讨论集中在几个概念的界定上,比如“何谓社会”、“社会学是关于什么的学科”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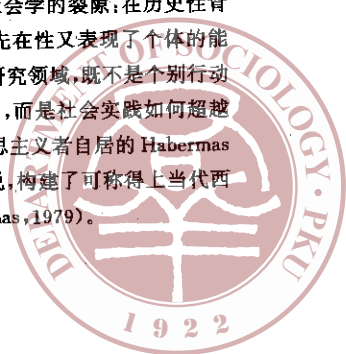
各式各样具体的应用的方法得到了强调,而另外一些方法则有意无意受到冷落<sup>①</sup>。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对社会学元理论的讨论,使得像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史这样的学科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可以说,长期以来,方法论一直是国内社会学学科领域的弱项,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西方社会学思想的最近发展,无不首先是从方法论上找到突破口,或者正是因为沿着独立的理论—方法论思路深研下去,才各在综合的或分析的意义取得理论知识的积累。<sup>②</sup> 本文试图结合国内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的现实情况,就有关方法论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

## 一、作为引子的问题

一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问题,也许可以触及方法论中一些被忽视的问题。我在这里准备提出的问题是:进行社会学、人类

① 在“定量社会学”和“定性社会学”的两分法里面,隐含的偏好使后者在教学中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强调。无论在教材里,还是实际研究中,缺少量化手段的人类学方法、民俗学方法论、批判社会学等等研究取向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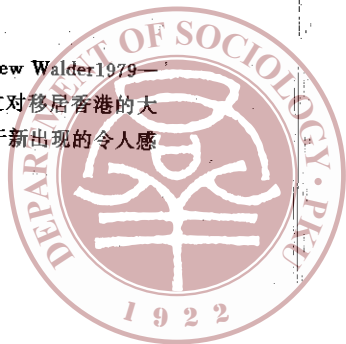
② Giddens 和 Habermas 可以作为典型例子。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Giddens, 1984)很明显是想调和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裂隙;在历史性背景中的个体的行动的不确定性既反映了结构的先在性又表现了个体的能动作用。“结构化理论”的特色在于“它所观照的研究领域,既不是个别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社会整体的任何一种存在形式,而是社会实践如何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形成秩序”(第2页)。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 Habermas 则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综合各派学说,构建了可称得上当代西方理论界最雄心勃勃的“沟通行动理论”(Habermas, 1979)。



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的准备工作和研究结果，即作为：“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分别是什么？

关于研究的准备工作或输入，典型的教科书首先会告诉你，这主要包括：与研究工作相关的理论和经验信息的掌握，基本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确定，研究计划的设定。未被充分重视的还有研究者的个人特征，以及他对研究结果的预期。至于研究的成果，最基本的是以调查报告、学术论文和书籍或数据库形式发表的正式成果，可作为产品提供给研究资助机构，或知照广大学术同仁以引发评论和批评。隐藏着的是研究者的非正式体验和感受；研究成果的社会后果一般也不包括在内。在这里，与下文的讨论相关的地方有：1. 研究者在准备阶段掌握的与研究相关的信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是不充分不完整的。a. 因为方法论原因而造成的有意忽视某些信息，排斥某些方法或技术。b. 对决策过程的研究表明理论工作所需的“充分信息环境”是很难达到的；在决策中，人们常常用令人满意的原则代替最优化原则(H·西蒙, 1989)。2. 研究者因为偏好某种研究方法而导致的“替代方法缺失”(the absence of alternatives)所造成的损失。3. 与选定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相联系的“非完美性”，即每一种方法和手段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4. 研究者事先的预期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5. 以及研究者对预期外事件的反应类型。在这里，使用“系统”作类比的意图就是想突显“研究过程本身是一个反馈过程”这样一种事实<sup>①</sup>，实际上，有人把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过

① 最近遇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 Andrew Walder 1979—1980 年到香港收集资料撰写博士论文，主要手段是通过对移居香港的大陆移民的访谈。在研究期间，他发现原先的研究设计由于新出现的令人感兴趣的新印象而大大改变了 (Walder, 1986: Xiii—Xv)。



程称之为“黑箱”，并且用于称呼人类尚不能把握的知识领域，比如人的神经心理过程、市场过程等。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预期是理性所具有的功能，而研究过程本身即是认识论的天然对象。Habermas(1971)区分了人类的认识旨趣，那么能否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区分一下旨趣；Freud(1932)阐明了释梦的机制，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对研究过程中事实阐释的机制作一番探讨。费孝通先生(1995c:65;1996a:18—19)提出了用个人经验(其实也是社会的、集团的)借助于文化参考系统(或“文化表格”)来解释非预期的和不能预期的异文化表征这样一种做法，已经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一个例子。认知心理学、哲学认识论都是我们可以汲取养料的地方。

## 二、主流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现状

高校社会学教学在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以美式实证论为主导的。从社会学理论教学来看，大约有经典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之分<sup>①</sup>，而当代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则长期以来没有在教学上安排成为一门坚实的课程，理论教材往往也成了断代史，最新的发展很少能反映到教学中来。从方法论教学来看，尽管实证方法得到强调，但方法论教学 and 实际经验研究却没能很好结合起来，以至于学生对实证方法论的理解和运用并不理想。学生们面对

<sup>①</sup> 经典社会学在这里主要指以 Marx, Weber 和 Durkheim 为主，包括 Pareto 和 Simmel 等人在内的作品集合；而现代社会学则主要涵盖了从美国社会学二战后的功能主义 Parsons“学派”一枝独秀到六七十年代自然主义社会学、批判理论和以符号互动论为代表的主观社会学的三足鼎立这一变动的景观历程。M. 波洛玛(1989:7—14)曾经提到过以上三个学派的互相对立。



研究任务而能够独立形成假设(概念、变量),并且把假设的变量设计成指标的能力还有待证实,实际上可以说是十分缺乏训练。尽管有些社会学工作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sup>①</sup>,但朝这方面努力的倾向仍不明显。另外,其它方法论,包括独具特色的社会学调查方法,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和支持;关于这些方法论的专题讨论鲜有所见,使得学生不能知悉详情(well informed)。其它的还有很细腻的分析力度极强的现象学方法和民族志方法论,也由于知之不详而没有能够进入研究工作者的视野。语言本来是 Malinowski 首肯的文化表格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费孝通, 1995c: 61),但是社会语言学也并没有找到它在社会学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位置。以上种种,造成:1. 由于不分情形长期强调使用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使得这一方法的缺陷逐渐明显地表露出来(某些类型的研究很难说能用以抽样为基础的问卷调查法来做;又比如态度研究中的设计应该借鉴其它学科领域,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知识)。2. 即使在实证方法成为必要的时候,也会由于采用实证方法本身存在的设计和 implementation 问题,影响了研究效果,导致研究者和学生对这一方法的疑虑和反思。实际上,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纯粹以实证主义数量方法来做的高质量的研究还难得一见。许多研究事实上都综合了各种方法。这一切都造成了社会学学科领域的隐患,表现为学科规范性尚未很好地建立起来,而社会学本科生多年来对选择在本学科内继续深造之兴趣的低迷则可以证明,由于学科建设尚未彻底完成,学生们没能带着兴趣深入到进一步的学习中去。

① 罗斯的《当代社会学研究解析》(罗斯,1988)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本活泼而生动的关于实证研究个案的入门教材,译者是北京大学的林彬、时宪民等人。



### 三、也谈“本土化”问题

“社会学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长期以来高举的一面旗帜，以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者坚持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学以致用”的原则，开创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影响至深至远（费孝通，1994b:5;1996a:3—4）。在现在的情境中再来看“本土化”这个问题，我想至少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提及：一个是65年前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条件是什么，65年后的今天这些条件是否仍然存在，还是已经有所变化；另一个就是联系当前国际学术活动中出现的新迹象新气氛，来看看对我们在今天坚持“社会学本土化”有什么影响和启示。<sup>①</sup>

#### 1. 历史境况的变迁

从严复翻译 Spencer《群学肄言》一书开始，到社会学进入大学讲坛，可以算是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发展，这一段时间大约有

<sup>①</sup> 在本文初稿写成之后，恰好有幸翻阅了1996年11月韩国社会学和国际社会学联合在汉城举办的题为“东亚社会学的未来”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的主题大致都是围绕着社会学在东亚的“本土化”问题的。汉城大学社会学系 Kim 教授的观点值得在这里提起。他认为，“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免受文化依赖和种族主义之苦的独立的社会科学……文化上独立的社会科学，并不是意指文化上中立的社会科学；它只意味着社会科学不再受西方核心国家的垄断，而且在世界上其它社会中，也可以产生以自身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而且）本土化了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的和普遍的趋势和特征”（Kim, 1996, 19—20）。这一关于普遍和特殊的关系的看法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启发。



几十年。<sup>①</sup> 尽管当时的情况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参见费孝通，1996b：Ⅱ—Ⅲ），但至少当时的社会学的成长是规范的，在师资上也有一定的积累，从一系列内外条件来看，提出“社会学本土化”这个口号应该说也是合乎自然的：当时的环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威胁，把知识分子推到忧国忧民的前沿；爱国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交织中很容易走向具有爱国民族主义的一面，就像在产业界和科技界出现的情况一样。此外，儒家的人世传统和“学以致用”观念，至少也提供了研究现实问题的伦理支持；同时，和国外学术界的多方联系，比如 Park 和 Radcliffe-Brown 的来华讲学（费孝通，1994b：3—4），也使得中国社会学界有可能找到推进“本土化”的途径。只是上天给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实在是太差；抗战和内战阻碍了“本土化”的进程，建国后的意识形态要求更是取消了社会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可能性。20 多年后，当我们恢复和重建这门学科时，再去接续“社会学本土化”这个计划，则可想而知面临着艰巨的困难。要在一个几乎空白的地方起家，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劳苦。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这个责任，开始搭台“补课”。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历史条件又是如何。我把它归纳为三点：1. 面临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的问题；2. 和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进程的疏远使我们对这一学科领域的新知识

<sup>①</sup> 如果我们的目光再宽泛一些，在严复 1903 年译著出版之前，就有谭嗣同 1896 年在《仁学》一书中提到“社会学”，章炳麟 1902 年翻译出版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更早一些，则有康有为、梁启超 1891 年在万木草堂把“群学”列入经世之学中。最早在大学中设置社会学系的是 1913 年沪江大学，1921 年厦门大学，1922 年燕京大学。参见：韩明谟（1987：17—32；55）。



的积累十分陌生,亟需弥补;3.“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力资本损害:学统被打烂了,真正的学术精神和规范中断了。

当时的这三个初始条件,经过十几将近 20 年的时间,现在又变得怎样呢?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一个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没有受到重视,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们在回到经典的时候,回到 Weber,回到 Durkheim 的多,回到马克思的少;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学思想缺乏系统研究,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发展也知之甚少。其次,在对西方社会学知识积累的补课过程中也出现了两个不足。一个是忽视了西方主流社会学自身的危机,从而没有认识到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致命弱点,同时对当代新理论新方法的发展无暇顾及,知之不多。另一个就是:即使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把握也是残缺不全,主要的问题很少组织精心的讨论。第三,人才和学统的断裂尽管有所弥补,但整个社会学界仍然缺少统一的规范,缺少方法论上严密科学的争辩以及由争辩而导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本土化”必定面临困难:很少见到扎实的支柱性概念(或者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来自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理念对中国现实的反观,或者来自历史的文化经验);人才队伍及其基础与其它学科相比仍显薄弱;缺乏良好的学术交流和沟通机制;学术刊物的导引作用至今也尚不明显。作为一个学生,我的这种目光可能过于苛责了。毕竟中国社会学的新生命才只有短短的不到 20 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大批学者遵循“本土化”的原则,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比如城乡关系、边区发展和民族关系、家庭状况、社会结构和农村研究等等。可以说,“社会学本土化”的原则已经不约而同地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共识(金耀基、萧新煌等,1993):只有研究中国社会,才能真正保持社会学的生命力。但是,正如我上文多次提到的,目前的现状,尤其是在方法论领域存在的问题,损害了“本土化”的进程,也损害了社会学在整个社会科学





中的地位。因此,从学科本身的角度来讲,作为“本土化”的基础的知识积累还不坚实,仍然需要加大学科建设的力度,尤其是在基础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

## 2. 与国际社会科学新趋势相联系的情况

国际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中,与本文相关的方面有:跨国数据库的初具规模;国际社会科学比较研究项目的开展;以及跨学科专业领域的风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1996)。社会科学的资料问题,主要是由社会科学所谓的验证性造成的;命题的提出,当需要得到事实经验的证实,而由于社会科学的预测大多是长期性的,因此需要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以为佐证。同时,作为社会科学理论本身特征的“外在效度”,也对空间范围的推演提出要求:理论希望扩展它预测的范围,及至最后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定律。在以往的理论中,这两个要求大多是隐含的,而现在,社会科学发展到了把“资料”和“验证”问题当作自己得以存身立本的大问题。而西方社会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诸如道德和价值观变迁、民族种族关系紧张、犯罪和越轨等等)以及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合作计划和项目的提出,都为在多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时间序列研究铺陈了条件。在各国专家的精心准备和努力实施下,欧洲首先成为多项跨国研究的承担者和受益人。<sup>①</sup> 而以“社会转型管理”为名的对发展中国家

① 参加《1990—1991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 43 个国家中有 31 个是欧洲国家,参加 1990 年实施的《国际社会调查计划》的 17 个国家中有 13 个是欧洲国家;另外,在 1981 年和 1990 年两次进行了“欧洲价值观调查”,先是在欧共同体国家范围内进行,后来扩展到东欧。关于这些多国比较研究的成果,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1996)。



的社会转型历程进行跟踪研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也正在展开。<sup>①</sup>可以说,西方社会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促使它走出一国的范围,而追求比较研究所能带来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另外,在各个研究项目中,来自世界各大学和科研单位以及科研管理机构的学者专家大多分属不同的相邻学科,因此伴随着国际比较研究的进展出现了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sup>②</sup>具体落实到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由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改良主义所激发的热情早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sup>③</sup>

现在看来,西方社会科学为了解决方法论中所遇到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发展“多国时间序列的比较研究”。<sup>④</sup>与之相对应,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者也在努力寻

- ① 参见 P. Lengyel, 1995,《社会转型管理:社会科学第一个政府间项目》,《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Vol. 12, No. 4, 页 113—119。作为由政府间组织实施的社会科学项目,社会转型管理的研究主题包括:1. 多元文化和多族群文化社会变革的管理;2. 作为加速进行的社会转型之场所的城市;以及3. 如何在本地和本地区应付全球经济、技术和环境的变化。此外,“社会转型管理项目还将以信息、文献和数据元件资助发展中国家建设科研机构和加强科研能力”(页 116)。
- ② 一种新的关于“跨学科研究”的观点是:并不是需要把某些学科合并起来,或者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事实上,涉及各个学科的研究是把各门学科的某些部分,即一些专业领域结合起来,也就是“杂交”(Dogan, 1995, 37—38)。
- ③ 自从 Parsons 从欧陆引入“体系”理论之后,芝加哥学派就开始从兴盛的顶峰回落。“广涵理论”隐含的假设就是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框架,每一个大型的问卷调查项目由于假设了变量和差异性的存在,因而都在不同程度上是演绎的。美国社会学近 30 年来的发展,则更多地表现出多元主义的特征(Turner, 1995)。
- ④ 目前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态度调查和价值观变迁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



求解决这两个问题。费孝通先生(1996a:13—14)提出“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收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这样一种策略来解决“空间”问题;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本身即是一个“截面法”,通过在一个截面里同时显示不同的时间要素从而从理论上构造出一个时间序列来,这样用以解决“时间”问题。这些观点肯定了人类学工作本身特有的价值,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两点来作为补充:首先,根据功能主义文化理论与美国社会学广涵理论的亲缘性,可以认为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本身已经包含了演绎的特性,即可以用演绎的方法把“类型”和“模式”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框架,或者说,理论先设的分类来看待。“微型社会学”的依据就在于一个微型社区从理论要素的意义上来说是完整的(费孝通,1996a:14),每一个微型社区都是某个形式框架的内容,是源于普遍的特殊。因此,微型社会学除了要理解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之外,还应该在“形式框架”之下发展出一系列分析性概念来<sup>①</sup>,这是一

国教科文组织,1996)。另外一个取向是“历史社会学”的复兴:D. Smith (1991)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扼杀了历史社会学的批判视野,直到70—80年代,历史社会学才好像一只涅槃的凤凰从灰烬中再生,反映在Immanuel Wallerstein, Michael Mann, Perry Anderson和Anthony Giddens等人的作品中。《历史社会学是理性的、批判的和富有想象力的》(页.1),“它研究过去,以期发现社会如何运行和变迁……而非历史的社会学则既在经验上忽视过去,在概念上把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抛诸脑后;也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历史性(historicity)”(页.3)。

① 这个“形式框架”的主体可由功能主义文化理论的要素构成,再加上两个维度:一个是层次性,另一个是考虑到时间因素(即“活动”、“活动者”)。在物质方面可以考察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对物质领域和人的生理、心理状态的控制导向了作为社会关系的经济和政治以及其它制



个可以展开的工作。其次,我们还应该参照“历史社会学”(Smith, 1991)的做法,要提倡进行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做长时段的论域或个案分析。<sup>①</sup>

度性设置的产生,集体行为、权力、服从和统治成为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关注点;最后,象征体系(包括意识形态、精神和价值等等)和仪式化行为成为反省“历史和实践”的主要文化手段,或者为牵涉其中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承诺”(commitment)。强调“活动”因素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群众的“反省性”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将作为反馈因素进入分析框架,推动“内容”发生变化。强调层次性是因为每一个领域的现象都具有水平上的多重性,比如人与环境的关系,既可以从微观资源经济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加以讨论。但这又引出另外的两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首先上述三个领域的每一个“亚域”,还是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例,都可以从物质、社会和文化三方面来展开讨论,就像Parsons的“AGIL”行动框架一样,每一个子系统也都有它们的功能先决条件;其次,物质、社会和文化三分法本身也不是严格离散的,而是从物质经由社会性行动到意识,从个体经由制度到象征体系的一个连续统。以“经济”这一范畴为例,它既起源于和自然的密切关系,又成为社会建构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且让我们听听历史学家的看法:作为实体的社会“并非一个简单的容器”,而是“包括经济层面、社会等级制和政治、文化在内的一系列设置(a set of sets)的总和”;任一单独的领域都不能获致“相对于其他部分而言的持久的优位(superiority)”,更为重要的是,各部分之间的边界具有“水一样的流动性”(Braudel, 1982: 458—461)。

- ① 比如针对现代国家的形成、工业化、现代性等主题的比较研究,几乎每一个历史社会学家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然而,过分借助于历史学方法以及关于文化科学的独特性的论调这一做法遭到了科学主义者的批评。Kiser & Hechter(1991)注意到了最近几年来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的急剧变化,表现为“对广涵理论模型的批评增多了,而对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以及归纳方法的价值的强调却加强了”(第1页)。他们对这种现象作了细致的剖析和批评,“对归纳方法的过分依赖将导致许多当代学者忽视历史解释中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的重要作用”(第24页)。



#### 四、“元一元理论”:多元主义的观点

诉诸“元一元理论”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讨论方法论问题的必然结果。我把“元一元理论”解释为指导方法论讨论的原则和态度,一种情绪,一种偏好,或者一种立场。社会科学从它诞生以来,“统一”一直是它追求的目标,但是到目前为止,也许只有“分歧”一词才更能确切地概括几百年来历史事实:持极端观点的理论家相互指责攻击,伴之以走“综合”路线的学者完成学术史上的重要成就;或者,理论家们的每一次转换视角都可能带来学科的进步,仿佛是在走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参见王铭铭,1996; Giddens & Turner, 1987)。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形成统一的范式吗?论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的文献构成了社会学方法论讨论最初的主题。然而,现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领域也发生了变化:Kuhn 宣告了科学知识本身的相对性,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和政治维度(Kuhn, 1970); Popper 则宣告了归纳法和“本质论”的逻辑困境(Popper, 1957)。对自然科学重大发现的专题研究表明,科学工作过程本身也不是一件确定性很强的事情,其中充斥着偶然激发的灵感、直觉、猜度和动摇。科学家们甚至为了寻求支持而相互“磋商”(negotiation)。<sup>①</sup>不但如此,作为知识论基础的真理观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符应说”(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sup>①</sup> Kuhn (1970) 和 Whitley (1984) 指出科学组织和所有的社会组织相比并无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科学活动的内部充满着政治、利益和协商。另请参见邱泽奇(1996: 1100)。



truth) 受到了我称之为“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的挑战。“符应说”主张真理就是与事实相符合,认为陈述可以和事实相一致(黄瑞琪,民国74年:90—91)。而“相对主义”真理观则认为在知识和“brute fact”<sup>①</sup>之间存在无法穿透的遮蔽:1. 知识是反省性的,因而是相对的;2. 知识是流动的,因而是发展的而非绝对的;以及3. 知识是情境性的,因而和条件相关联。<sup>②</sup>因此,“相对主义”真理观隐含的价值就是“个别知识是不完整的,作为知识的整体也由此在本体论上存在缺陷”。

我们无法判断“符应说”和“相对主义”真理观究竟谁更正确一些。与“符应说”相联系的方法论变体仍然在研究工作

① 此处借用 Clifford Geertz 的一个概念。Geertz 原来用这个概念表示“事或物”在没有被意义附加之前的原初状态,而我则用它来指称认知对象的客观性。在 Geertz 看来,“民族志工作者不可能看到报导人所看到。他所能看到的,而且相当不确定的,是他‘用’、‘以’或是‘透过’某种方式所看到的。……并不是置身想象我是他人,一个种稻的农民或是一个酋长,然后看我所想的,而是通过找出并分析其象征性的形式——字词、图像、制度、行为——透过这些象征形式,在每一个地方,人们确实相互彼此呈现表征”(1983: 58)。因此,“brute fact”只有附加上意义之后,才对人类学者有意义。

② 例如,在 Foucault 那里,知识是某一时代或历史时期里可见的和可说的事物的配置和分布,其分布就会因不同时代而变异,因此,知识或真理是历史化的。知识既非科学,也不是人的认知的积累与总合,知识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这种或那种客体形态被置入认识活动以及这个或那个表述被形塑出来所必需的条件”(Foucault, 1972: 15)。Reinhard Bendix 也认为知识具有“境遇性的(circumstancial)、制度化的和非理性的基础”(1974: xviii),因此,在一个受“意识形态魔化”困扰的文化中要想产生可靠的社会学知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将把理论误导向自然科学的模式(Bendix, 1970)。



中大量运用<sup>①</sup>：任何一个分析框架的提出都隐含了整体论的知识背景（T·奎因，1987）。然而，“相对主义”真理观也在某种程度上切中要害，指出了规约知识生产过程的种种外在因素。这种元理论的变化无疑将影响到学术态度的转变。强求“统一”既已不可能，个别知识既然是不完整的，那么就要接受“真实的神话”这个事实，步入以“多元主义”为特征的“元—元理论”境界，一种真正的相对主义精神。它的主要特征是：1. 承认分歧和差异是自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取向都各有优劣，因此无须强求统一，把时间浪费在争议中。2. 认为学术工作可以有一个分工体系，以使个别知识的积累达到综合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分工包括：a. 承认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的实质性区分；b. 承认分析性工作和综合性工作的互补（分工的最后目标是构筑一个整体性的知识体系）。3. 确认分析性框架对知识生产的逻辑意义。4. 坚持理论评判的标准应该考虑到下列因素，即知识的反省性、条件性和动态性，以使评价更贴近知识生产过程的特性。

## 五、文化批评

作为分析性框架的三个要素之一的文化领域，可以引发的

① 尽管由于持反对意见的理论家认为并不存在社会世界（social universe）的不变本质，因此“关于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能动作用（agency）的问题使得社会学分析成为解释性的和临时性的”，并由此得出“科学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结论；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代表的 Turner 仍然希望能够抓住社会世界的关键的和不变的本质以及它们如何运行的动力学机制（Turner, 1989: 8）。



概念很多。上文已经提到了要把文化史研究充实起来的想法,但就目前的学术工作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文化批评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费孝通先生曾经多次提到对文化或人文领域重视不够(1994a:15—16;1994b:8;1995b:70—72;1996a:20)。我把它理解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个人和集群的精神历程和状态关心不够;另一个是总的历史性评价才刚刚开始(马戎,1995)。如何认识文化批评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我这一节中主要要讨论的问题。

### 1. 文化史和文化批评是相辅相成的

文化批评与其说是一个纯粹学术性的工作,不如说它具有更多的历史涵义。“传统”与“现代”的概念对立本身即包含了文化变迁和认知演化的成分在内。我个人认为,就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文化批评承担的是“概念建构”的部分<sup>①</sup>,是为文化史的写作提供视角和线索的理论过程。因此,我认为文化批评和文化史研究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折面(facets)”:文化批评就是关于文化领域中的分析性框架的设计、争论、引论、阐述和明晰等过程的总合,而文化史就是这一分析性框架在各要素领域的展开。

① 我的观点是:在概念的建构中已经体现了批评的脉络。这在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中表现得极为清楚。“五·四”运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有哪些,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到底如何,上述种种问题的解答,必得首先运用概念手段。概念即界定,而界定必得有其理论知识的背景;同时,界定也必得运用价值判断,从而使表述同概念的倾向性相联系。参见孙隆基(1990)。





## 2. 普遍的文化机制抑或特殊的中国文化现象

什么是文化机制？是否存在普遍的文化机制，以及无论普遍的，还是非普遍的，文化机制如何作用到它所笼罩的特定地理或心理区域？这些问题本来可以不加讨论，因为实在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机制(machanism)”这个术语本身即包含了自我生长、自我维持的意思，是一个正宗社会学的名词，拥有可以把另一种类的意识中心——“个体”当作对象来加以影响，加以改变的突生的属性，这种属性，赋予了“机制”一种操纵“思想、情感和行动能力”的地位，从而引起理论家的反抗。<sup>①</sup>文化机制，简而言之，就是形塑具体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之安排的制度化的生产和调节系统；它指明起源、提供标准，并且以理念观照现实。<sup>②</sup>在我这里，“机制”只有在要素框架的意义上才是普遍的，而在它的构成、意向和生命力上，则无从奢谈什么普遍性。常规的进化路程(routine process)，必须考虑到系统矛盾(systematic

① 比如，对是否存在普遍的单线进化模式的怀疑，导致了一种强调“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的方法论的诞生。从这种意义上说，“机制”(machanisms)可以衰弱和死亡，也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实行分配，从而由于它们特定的时空性，而与普遍的相去甚远。例如在 Giddens 那里(1981: 81)，资本主义的发展深植着不同于先前历史的一系列根本性的“断裂”。

② 这里所说的“文化”一词，通常需要从其最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内容，其实在总体上与前文提到的分析性框架相一致。Braudel 关于“地中海世界”的著作，例证了我所理解的“文化”意涵：地中海是一个伟大的景观(spectacle)——因此，地理结构、气候(人与环境的关系)、习惯、风俗(群体、集团命运和社会趋势)，生产与贸易以及政治和军事事件等，全部包括在视域之内(Braudel, 1972)。



contiadiction)和基层能动力(infastructural capacity)的同时并存,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由于后两个维度的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其差异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像中国这样的独特的历史地理单位无法和其它时空分享共同的路径或“机制”。而关于上述系统矛盾、基层能动力以及竞争性选择之类的相互关系如何在中国的时空中展开,则正是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也是一个激励我们努力的新方向。

### 3. 文化批评的实质和意图

文化机制既然是在普遍要素框架之下寻找特定构成类型的努力的结果,那么首先,文化批评的工作就在于建立这一普遍的要害框架,正如上文已经谈到的,可以把文化批评看作一种概念工作。概念工作的背后隐含着要用它来整理特定时空经验资料的意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批评是分析性的:它需要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对话,乃是一种游离于各种现实(无论现在的,还是过去的),以及在此基础上分类、对比和提炼的过程。

其次,由于文化机制的时空特定性,导致了我们所说的理论家的道德问题。人们能否改变系统矛盾和基层能动力的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能否克服文化机制相对于“个体”的强制性所产生的“异化”现象?如此等等的问题,使得一种“超然(detachment)”精神成为不可能。文化批评是一种“介入(invovement)”,是道德性的。

以上文字,断断续续是对费孝通教授《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的反应。费先生在文中主要涉及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界尚未



完全清晰整理过的领域;无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地位,“本土化”过程的条件,还是社会学史、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的缺失,以及文化史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迫切性,以及最后,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态度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讨论和建设。本文在指出这些缺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以使得方法论问题能够不再阻碍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一种相对主义的多元精神投入到研究中去,可能会比单一执著的心态更加适切。

### 参考文献

Bendix, R. :1970, *Embattled Reason. Essays on Social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波洛玛, M. :1986,《当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

Braudel, F. :1972,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 (2Vol. s)*. Translated by Sian Reynolds. London: Fontana. 1982,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ies*. Vol. II: The Wheels of Commerce. Translated by Sian Reynolds. London: Collins.

Dogan, M. :1995年《社会科学的分崩离析及各专业围绕社会学的重新整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Vol. 12, No. 1:《社会学学术状况(1):基础、制度和文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53页。

费孝通:1980年,《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108—112。1982年,《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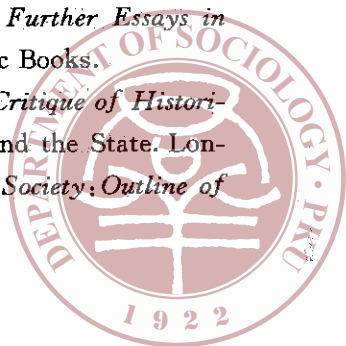
见》,《社会学通讯》,1982年(3):4—8。1986年a,《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社会》,1986年(2):1—5。1986年b,《同社会学界朋友们的谈话》,《社会学研究》,1986年(5):8—10。1994年a,《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1):7—17。1994年b,《略说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1):2—8。1994年c,《关于人类学在中国》,《社会学研究》,1994年(2):1—4。1994年d,《人不知而不愠》,《读书》,1994年(4):41—54。1995年a,《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2):4—14。1995年b,《晋商的理财文化》,《读书》,1995年(5):67—72。1995年c,《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6):53—68。1996年a,《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收入马戎、潘乃谷主编,邱泽奇、王铭铭执行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1996年b,《序:开风气·育人才》,收入马戎、潘乃谷主编,邱泽奇、王铭铭执行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i—Xii。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Freud, S.: 1932,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London: Allen.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Giddens, A.: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I: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ddens, A. & J. Turner. (ed.): 1987, *Social Theory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bermas, J.: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韩明谟: 1987年,《中国社会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黄瑞琪: 1985年,《霍克海默之社会批判理论的概念》,收入黄瑞琪编著,《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台北:巨流图书公司,民国74年。

Kim, Kyong-Dong: 1996, "Toward Culturally Independent Social Science: The Issue of Indigenization", Pp17—36. in *The Future of Sociology in East Asia*, the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pared for East Asia Regional Colloquium. November 22—23, 1996,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Kor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oam Center, Seoul, Korea.

金耀基、萧新煌等: 1993年,《台港及海外华裔学者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专辑》,《国外社会学》,1993年(3—4)。

Kiser, E. & M. Hechter: 1991,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pp. 1—30 in *AJS*, Vol. 97. No. 1, July 1991.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

奎因, T.: 1987年,《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斯, G.: 1988年,《当代社会学研究解析:社会学调查报告的系统分析》,林彬,时宪民等译,袁方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马戎:1995年,《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体文化》,收入乔健、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2—374页。

Popper, K.: 1957,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邱泽奇:1996年,《建构与分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过程》,收入马戎、潘乃谷主编,邱泽奇、王铭铭执行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095—1150页。

Smith, D.: 1991, *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孙隆基:1990年,《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二十一世纪》,1990年12月,总第二期,第47—65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Turner, J.: 1989, "Introduction: Can Sociology Be a Cumulative Science?", Pp. 8—18 in *Theory Building in Sociology*, edited by J. Turner.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5年,《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去、现在和未来》,《国外社会学》,1995年(5—6):40—51。

Walder, A.: 1986, *Communism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王铭铭:1996年,《人类学与文化学说》,《国外社会学》,1996年(1—2):1—27。

Whitley, R.: 1984,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Organiza-*



*tion of the Science*. Oxford: Clarendon.

西蒙, H.: 1989年,《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5年,《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Vol. 12, No. 4:《欧洲社会科学数据库及其在跨国分析中的作用》。1996年,《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Vol. 13, No. 3:《跨越民族的根本价值》。

